

歌谣运动与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发端

王倩倩 曹志耘

提 要 歌谣与方言具有天然的关系,研究歌谣离不开研究方言。一百年前,歌谣运动使得方言问题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继而成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方言调查研究的学术团体“方言调查会”。方言调查会的骨干成员们对方言调查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理论主张和操作方法,对后来汉语方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某些方面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 歌谣运动 汉语方言学 方言学史 方言调查会 方音字母

一 歌谣运动与方言问题

1.1 歌谣运动

歌谣通常是指在民间口头传播和歌唱的韵文体短歌,包括有旋律的民歌和无旋律的歌谣,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则包括劳动歌谣、仪式歌谣、时政歌谣、生活歌谣、爱情歌谣、儿童歌谣等。我国歌谣历史悠久,数量巨大。歌谣多为劳动人民所创作,内容通俗,形式简陋,除《诗经·国风》、汉乐府民歌等少数名篇外,很少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视。直至 20 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俗文学文化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歌谣一度被视为“民族的诗”和“新文学范本”。在蔡元培、沈尹默、刘复(后名刘半农)等人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发起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歌谣的活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当中,史称“歌谣运动”。

1918 年 2 月 1 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征集歌谣的《校长启事》和《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宣布成立“歌谣征集处”,向全国各地征集民间歌谣。征集的成果将编印成《中国近世歌谣汇编》《中国近世歌谣选粹》等。征集启事一经发布,便引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据 1918 年 5 月 20 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简讯《〈歌谣选〉由日刊发表》所述,“本校自二月初发起征集全国近世歌谣以来,进行甚顺。计所收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由刘复教授选其最佳者略加诠订,名曰《歌谣选》”。

1920 年 12 月 19 日,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主持,继续征集近世歌谣。1921 年 11 月,北大研究所成立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并入其中。1922 年 12 月 17 日,《歌

作者简介:王倩倩,女,江苏徐州人,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电邮:wangqq_blcu@163.com。曹志耘(通讯作者),男,浙江金华人,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地理语言学、语言资源保护,电邮:caozy@blcu.edu.cn。

谣》(周刊)^①正式创刊,并随之扩大征集范围,除歌谣外,还收集神话、传说、童话故事、风俗、方言等资料。《歌谣》一开始作为《北京大学日刊》附张发行,编辑为常惠、顾颉刚、魏建功、董作宾。随着征集材料的增加,附张已经无法满足需求,1923年9月23日,《歌谣》开始独立发行。1925年6月28日,《歌谣周刊》停刊,并入新创办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3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1936年4月4日,《歌谣》复刊,由徐芳、李素英任主编。因时局动荡,《歌谣》最终于1937年6月26日停刊,歌谣运动也宣告结束。至此,歌谣运动共征集到15316首歌谣以及三本歌谣集和两本民间文学集,并辑录出版了部分歌谣和故事,如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和《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董作宾的《看见她》等。(曹志耘 2025)

1.2 方言问题的提出

“歌谣原是方言的诗”(周作人 1923)。民间歌谣都是由老百姓用当地方言口语创作和演唱的,其中自然带有很多特殊的方言词语,有些词语可能写不出字来,有些字的读音可能很特殊,有些词语的意义对外地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先来看几个例子:

(1)《一只橘子抛上天》(孙本文 1922,通行于江苏吴江)

一只橘子抛上天,

亲娘养我勿值钱。(1)(2)

慢娘叫我拔长大,(3)(4)

拔长短……

原注(1)我,读鼻音。(2)钱,读如田。(3)俗称继母曰慢娘。慢,读上声。(4)拔长,俗语忽然之意。

(2)《丫哥哥》(容肇祖 1923a,通行于广东东莞)

丫哥哥,脚生毛;

爷做事,子唱歌。

原注:毛,音ㄇㄠ。

(3)《格臂草》(李在谦 1922,通行于河南黄河以北地区)

格臂草,就地鸟,

开黄花,结软枣。(1)

老娘不好我心焦,

拾篮麻糖去瞧瞧。(2)

原注(1)软枣,黑色小果。(2)麻糖,即油条。

可以说每一首歌谣中都包含方言成分,存在方言问题。如果不能准确记录和解释歌谣中的方言成分,必将大大影响歌谣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将大大影响所征集歌谣的价值。歌谣运动的倡导者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歌谣记录整理中方言的用字、注音、释义等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1918)规定:

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

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

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字音,能用罗马字,或 Phonetics 尤佳。

有有其音无其字者,当在其原处地位画一空格,如□。而以罗马字或 Phonetics 附注其音,并详注字义,以便考证。

在具体实践中,本字不明或有音无字者一般是用方言俗字或同音字来记写,未见有用方框

“□”代替的(一开始有用圆括号加竖线“(|)”表示的,后来少见)。原因很好理解,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歌谣文本最好是全部用汉字书写,如果在汉字行文中不时夹杂着“□”“(|)”或注音符号,势必难以卒读。当然,使用方言俗字或同音字难免会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字形未必合理,各地写法也难以一致。如例(1)中“勿”是否该写作“弗”,“值钱”的“钱”是否该写作“钿”,“慢娘”的“慢”本字实际上是“晚”,整理者或许不了解“古无轻唇音”的原理,遂采用了一个近音字。不过话说回来,要做到汉字书写的科学、准确、规范,首先需要对方言用字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在当时是做不到的——实际上今天也仍然难以做到。

读音特殊的字词如需注音,通常采用注音字母、“A 读如 B”或“读鼻音”“读上声”等说明语加以注音。国际音标在当时还很陌生,使用者极少。注音字母是 1918 年由政府颁布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故歌谣注音中常常会用到注音字母。不过,主要用于标注“国音”(国语语音)的注音字母无法准确标注各地方言里的特殊读音,而且也不能表示声调,所以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至于“我,读鼻音”之类的说明语,可以大致上表示某些读音特点,但难以做到具体、准确。当然,是否注音、注音是否准确,很大程度上要看记录整理者的注音能力。如例(2)中“丫哥哥”的“丫”会不会是词头“阿”字,如有注音或许就明白了。

歌谣里含有大量的方言词语,例如上文例中的“勿”“值钱”“慢娘”“拔长”“丫”“格臂草”“就地鸟”“软枣”“麻糖”等。这些词语既能体现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又能增强歌谣的口语性和生动性。不过,其中有的可能是残存的古语词,有的或是本方言自创的词,甚至是借自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或外语的词,因此需要对方言词语进行必要、准确的注释。当然,方言词注释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既要避免该注不注,也要避免注释过宽,更要做到注释的简明、准确。如例(1)中的“勿”应是“不”义,“值钱”应是“疼爱”义,没有注释很容易引起误解。例(3)中的“格臂草”在当地可能是口语常用词,但外地人却不知所指何物;“就地鸟”乍看似指一种鸟,不过新乡、安阳一带方言“鸟”字跟“绕”同音,都读[niau⁵⁴](上声)类读音,原文很可能是“就地绕”,因用字不规范,又缺少注释,结果可能就南辕北辙了。

方言是歌谣搜集、整理和研究中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歌谣运动一开始,这个问题便自然浮出水面。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歌谣运动的开展,才使得方言问题进入学者的视野,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甚至成为当时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廖尚可 2010)

二 方言调查会及其历史贡献

2.1 方言调查会的成立

随着歌谣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方言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24 年 1 月 26 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了“方言调查会”,由林玉堂(后名林语堂)任主席,成员有常惠、陈懋治、董作宾、顾颉刚、黎锦熙、刘声绎、罗庸、毛坤、钱玄同、容庚、容肇祖、尚献生、沈兼士、沈士远、孙少仙、汪怡、魏建功、温晋韩、杨世清、杨遇夫、张鹏翥、张煦、赵元任、郑孝观、周作人、朱希祖等众多专家学者。1924 年 3 月 16 日,《歌谣》第 47 号发表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1924 年 5 月 17 日,方言调查会举行第二次常会,决定改名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研究会”,并通过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研究会简章》(刊于《歌谣周刊》第 55 号)。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研究会简章》规定,本会宗旨为:“以语言学方法调查及研究中国的方言。凡方言的现象如语音,语汇,语法,俱当用历史的及比较的方法研究整理他。”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首先阐明了本会成立的缘由、目的,以及本会关于

方言调查研究的主张,特别是与古代“训诂学之一部分”的方言研究的区别。宣言书的主要内容则是“今日方言调查应办的事件与应考察的问题”,亦即本会的主要研究任务:

一、制成方音地图——此为语言调查(Linguistic Survey)的根本事业。

二、考定方言音声,及规定标音字母。

三、调查殖民历史……即方言与本地历史的密切关系。

四、考定苗夷异种的语言。

五、依据方言的材料反证古音。

六、杨雄式的词汇调查。

七、方言语法的研究。

方言调查会(方言研究会)是我国历史上首个方言调查研究的学术团体,在我国汉语方言学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2 方言调查会开展的主要工作

方言调查会成立后,随即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据1924年5月17日方言调查会第二次常会上林玉堂主席的报告,在本会成立后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举办了一期标音原则培训班(讲授方音字母及国际音标)、拟定了“方音字母草案”,并拟将继续推进中国比较发音学培训班、编写方音地图材料调查表等工作。从现有资料来看,方言调查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1924—1926年期间,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方音字母草案”的研制和实践。

基于歌谣整理和方言调查的急需,方言调查会把“考定方言音声,及规定标音字母”列为其第二项任务。所谓“考定方言音声”是指辨析、记录方言语音,而“规定标音字母”就是指在调查归纳各地方言语音系统和语音特点的基础上,制定方言标音方案。

1924年5月18日,《歌谣周刊》第55号专门出版了一期“方言标音专号”,登载了由林玉堂研制的《方言调查会方音字母草案》,以及北京、苏州、绍兴、绩溪、南阳、黄冈、湘潭、昆明、广州、潮州、厦门、成都、福州、蕉岭14个地点的方言标音实例(均为一段以“太阳说”开头的短文)。《方言调查会方音字母草案》(1924)一文内容全面丰富。文章开头详细说明了方音字母的性质、作用和拟定的原则、方法等,然后具体介绍了“方音字母草案”的内容,包括声母表、元音表、声调标法、声调的符号、变通方音字母以适用新方音的要则、国音韵母标法、词类连书、方音字母与国际音标元音对照表等。该草案有以下主要特点:1)以罗马字母为基础。即“限于二十六个字母,并且于二十六个字母的用法,也务求使与习惯无甚差别”,不新造字母。2)标声调。声调只标调类,不标调值,调值在说明中交代。在权衡“画曲线”(即标调型)、“用号数”(1、2、3、4等)、“用旁号”(在音节的四角加点号)等方法以后,该草案采用字母标调的方法,即通过主元音字母的特定拼写法以及添加特定符号来表示不同的声调。例如韵母为a的音节:a阴平,ar阳平,aa阴上,aa'阳上,ah阴去,ah'阳去,a'阴入,a''阳入。入声如有塞音韵尾,阴入不加符号,阳入重写塞尾。轻声不加符号。3)全国统一,各地微调。该草案是一个适用于全国汉语方言的原则性方案,具有统一的标音规范和变通规则。但鉴于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各地可“根据一方言中所有最少数必须分别的音来采取严式中最简便的字母去表他”,即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简化变通,比如可把上海话里的kaong标为kong。

“方音字母草案”设计理念先进,方法科学,实用性强,对今天的方言注音方案研制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方便读者参考利用,笔者把其中声母表和元音表的内容转录于下。但为便于阅读,形式上做了较大调整,并新增国际音标一列以示对照。

表 1 声母表

国际 音标	方音 字母	读法	国际 音标	方音 字母	读法	国际 音标	方音 字母	读法	国际 音标	方音 字母	读法
p	p	ㄅ	t	t	ㄊ	tʂ	ch	ㄘ	k	k	ㄎ
p ^h	p'	ㄅ'	t ^h	t'	ㄊ'	tʂ ^h	ch'	ㄘ'	k ^h	k'	ㄎ'
b	b	b	d	d	d	ʂ	sh	ㄕ	g	g	g
m	m	ㄇ	ts	ts	ㄗ	ʐ	zh	ㄗ	ŋ	ng	ㄣ
ɸ	fh	f(双唇)	ts ^h	ts'	ㄗ'	tɕ	ch	ㄘ	ɣ	gh	g(擦音)
β	vh	v(双唇)	dz	dz	(bi)ds	tɕ ^h	ch'	ㄘ'	h	h	ㄏ
f	f	ㄈ	n	n	ㄋ, ㄋ'	ɕ	sh	ㄕ	θ	y	ㄣ
v	v	ㄆ	r	r	r	j	j	j	θ	w	ㄨ
θ	th	th(in)	l	l	ㄌ				θ	yü	ㄩ
ð	dh	th(e)	s	s	ㄙ						
			z	z	ㄗ						

表 2 元音表

国际 音标	方音 字母	读法	国际 音标	方音 字母	读法	国际 音标	方音 字母	读法	国际 音标	方音 字母	读法	国际 音标	方音 字母	读法
ɪ/ɪ	y	ㄩ韵												
i	i	ㄣ	y	ü	ㄩ							u	u	ㄨ
e	e	ㄝ	ø	oe	圆唇 e				ɤ	ê	ㄝ	o	o	ㄛ
ɛ	ae	开ㄝ							ʌ	ü	开ㄝ	ɔ	ao	开ㄛ
						ʌ	a	ㄚ						

以下是绍兴方言标音实例的部分内容示例(林玉堂等 1924):

1. 我格名字是太阳。我是蛮亮格。2. 我从东方出来,我出来格时候,天就亮者。
1. Ngoo ki' mirngzyh si' T'ahyarng. Ngoo si' maeⁿ liangh· ki'. 2. Ngoo dzurng tungfong ts'i'laer, ngoo ts'i'laer ki' syrheu, tieⁿ shiuh' liangh· tsae.

三 方言学科建设思想

方言因歌谣而引起学界的关注。正如沈兼士(1923)《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所言:“原来歌谣是一种方言的文学,换言之,歌谣里面所用的语词,多少都是带有地域性的,倘是研究方言而忽却方言,歌谣中的意思,情趣,音调至少会有一部分的损失,所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也就是说研究方言是研究歌谣的基础,研究歌谣离不开研究方言。

但是,随着歌谣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大家逐渐认识到方言是一个相对独立、也是极为复杂的问题,方言研究是一门相对独立、也是十分重要的学科。1923 年 11 月 4 日,周作人在《歌谣》第 31 号上发表《歌谣与方言调查》一文,吹响了方言调查的号角。随后,《歌谣》发表

了一系列文章,还出版了《方言标音专号》(1924年5月18日第55号)、《方言研究号》(1925年5月3日第89号),对方言调查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甚至论战,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观点。

3.1 名称:“方言”与“方音”

“方言”一词,汉代扬雄就开始使用了,本不该有异议。不过,扬雄以及历代调查辑录方言的著作均侧重于方言词语、俗语方面。周作人出于其文学家和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身份,所提倡的“方言调查”也特别重视方言词语及其对国语以及新文学的作用。他说:“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方言调查“于国语及新文学的发达上一定有不小的影响”(周作人1923)。偏向语言学专业的学者们则认为方言调查不应仅限于词语,更应重视语音。董作宾紧随周作人之后,在《歌谣》第32号上发表《歌谣与方音问题》一文,引发“方言”与“方音”之争。一时之间,“方音”一词甚至有盖过“方言”的趋势,例如“方言调查会”曾有使用“方音方言调查会”的提议,“方音研究”“方音字母”“方音地图”等说法在当时也很流行。

不过,最终大家还是认同使用“方言”一词。正如林玉堂所说:“同一语言中又分为种种不同的‘方言’(dialects)。“方言”二字之足以包括方音,也犹如‘语言’二字之足以包括‘语音’,……我们要声明我们现在所谈的‘方言’是指该词在语言学上的意义,不是沿用扬雄书中所指的‘方言’。”(董作宾1924;林玉堂附记)

3.2 学科地位

在我国历史上,方言调查研究一直附庸于小学尤其是训诂学。歌谣运动兴起之后,方言调查研究成为歌谣搜集整理中的一项工作。不过,自“方言调查”成为议题尤其是方言调查会成立以后,对方言调查研究的学科地位和性质很快就有了清醒的认识。

周作人(1923)《歌谣与方言调查》就已认识到:“方言调查的利益不仅是歌谣研究能够得到,其大部分还在别的学问方面。”1923年12月17日,林玉堂在《歌谣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纲领性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一文,更明确地指出:“方音研究应有独立的身份与宗旨,不应做附属于歌谣研究下之一物。这两个应当做同等并行相辅相成的分科事业。”

沈兼士(1923)《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一文则具体指出了现代方言学与传统方言研究的三大不同点:

1)向来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言语。

2)向来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

3)向来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须利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之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风俗学……等科学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1924)称,扬雄式的方言研究“实不过是训诂学的一部分”,章炳麟式“语原学的考证,决不足以当方言研究的自身”。本会所说的“方言调查”是:“除去研究词汇同异之外,还有种姓迁移的历史,苗蛮异种的语性,古今音变的系统,方言语法的进化等等连带问题,都是方言研究分内的事。凡研究一方言,必并考察其背景历史,以穷究其源流;得一音变,必并考察其与邻近方音原委委之关系。即使异族方言,语不出于经史载籍,也无妨比串同异以推求周秦以往的语言系统,如西藏暹罗等语。是今日方言调查范围,非仅区区训诂学中之一事,而实为与音韵学,殖民史,印度支那语言学等不可分离的一种研究。”作为方言调查会主席,林玉堂也明确表示:“实际上我们本会的调查目的主意所在与自扬雄以

至章太炎及今日一班所谓‘方言考’的文章,专门注意调查某字与古某字有何关系的,根本不同。”(董作宾 1924;林玉堂附记)

值得注意的是,方言学先驱们在强调方言学科的独立性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方言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强调要结合历史、移民、民俗、少数民族语言、国语、新文学,当然还有歌谣等民间文学进行研究。

3.3 研究范围、对象和任务

林玉堂(1923)提出了研究方言应有的十个“语言学观察点”:

- (一)应考求声音递变的真相,及观察方言畛域现象。
- (二)应以《广韵》二百〇六部为研究启发点。
- (三)应使发音学详密的方法厘清音声的现象。
- (四)应注重俗话而略于字音。
- (五)应力求规则的条理或主说,应承认语言为有被科学整理的可能性。
- (六)对于词字应寻求文化的痕迹。
- (七)应博求古语之存于俗语中的。
- (八)对于文法关系应做独立抽象语言学上的研究。
- (九)应考求句法的同异。
- (十)应寻求俗语中最新的文法倾向。

这十个“语言学观察点”可以说是当时方言研究的重点工作,涉及语音分析、语音演变、历史比较、语法、语言文化等方面。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1924)所列7项“今日方言调查应办的事件与应考察的问题”来看,涉及方言语音系统(考定方言音声)、语音演变(依据方言的材料反证古音)、注音方案(规定标音字母)、词汇调查、语法研究、方言地图、方言与移民史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等方面,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已是相当完备。尤其是提出绘制汉语方言地图的设想,而且视之为“语言调查的根本事业”,列作方言调查会的首要任务,不得不说是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的。后来,沈兼士、董作宾等人把方言调查的范围进一步概括为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

3.4 研究方法

对于方言调查研究的方法,当时也有很多讨论和意见。其中最为大家关注、讨论最多的是注音方法问题。周作人(1923)《歌谣与方言调查》就提出研制罗马字母音标为方言注音。钱玄同(1923)《歌谣音标私议》则以国际音标系统为框架,用26个字母设计了一套用以记录各地方言的“声韵总图”(声韵母表,缺声调)。黎锦熙(1923)《歌谣调查的根本谈》认为注音是歌谣调查的根本,指出记录歌谣“非有能够尽量而且尽致地表现方言的语音符号不可。若只用汉字,简直是白费工夫”。魏建功(1923)《搜录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的观点最为激进,他主张搜录歌谣、记录方言“以国际音标为最合宜”,“就该全用音标注下来”,“应全注音标语调”,亦即所有歌谣文本都要用国际音标记录并标调。方言调查会则大力推行“方音字母草案”,并主张分为严式和宽式,分别用于“说明发音的实状”和“拼一方言之音”。(王雅观 2022)

容肇祖(1923b)《征集方言的我见》一文提出了方言调查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分类选字或词,制成一小册子”,也就是编写调查字表、词表。他建议把调查表分为名词、动词、代名词、形容词、状词、前置词、连词、叹词、助词9大类,大类下再分小类,并另设成语、比喻语、各地方通行的特殊的音母等栏目。

方言调查会成立时,林玉堂曾提出分发传单、制备地图、实地调查的方法,他的十个“语言学观察点”中也有一些是涉及研究方法的。董作宾(1924)《为方言进一解》综合各家观点后,指出方言调查会的调查范围是现代国内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调查方法包括填各种表式、实地采访、制方音地图、规定音标,研究任务是分类、证古音,研究方法包括参考国外的语言、古代的语言。这应是当时学者们对于方言调查和研究的范围、任务、方法的基本观点。

四 结 语

一百年前,在北京大学的号召下,歌谣运动应运而生,规模浩大,时间持久,成就巨大,影响深远。在歌谣运动中,不仅直接诞生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学科,也间接催生了与之相关的方言学。歌谣运动中提出的方言调查研究的理论主张和操作方法,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前瞻性,对后来汉语方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某些方面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和借鉴作用。

以歌谣运动时期的方言调查研究为参照,反观百年来汉语方言学发展的历史,有几点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1)学科地位的独立性。方言学先驱们对方言学科地位的独立性问题极为敏感,他们一方面要把方言调查研究与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相区分,另一方面又要与传统的训诂学式的方言研究划清界限。他们提出的研究目的、任务、方法等都具有很强的学科本体意识,例如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研究,以及研制注音方案、编写方言词典、绘制方言地图等。相比之下,自高本汉、赵元任以后的汉语方言研究,重心基本上都放在古今语音演变上面,方言学虽然脱离了训诂学的藩篱,在一定程度上却成了音韵学的附庸,而学科自身的一些领域(比如方言地图)反倒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发展。

2)跨学科研究。上文提到,方言学先驱们在强调方言学科独立性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这固然与方言学诞生于歌谣研究这个母体有关,也与当时综合性的研究范式和风气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方言调查研究的倡导者周作人、林玉堂、钱玄同、刘复这些人的身份就明白了。遗憾的是,歌谣运动之后,这些跨界学者全都转入了文学、历史和文化领域,方言学成了语言学者“独霸”的领域。虽然赵元任、罗常培等先生也曾关注歌谣的调查记录(赵元任 1930),但随着我国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的不断专门化,汉语方言学本该具有的强烈的跨学科性已越来越弱。

3)应用研究。一百年前的方言调查研究是因歌谣搜集整理的需要而兴起的,具有鲜明的应用指归。方言调查会所开展的最重要的工作“方音字母草案”的研制和实践,其目的就是服务于方言的记录和阅读。其他如周作人主张的以方言服务于国语及新文学,林玉堂所提的“对于词字应寻求文化的痕迹”等工作,也都着眼于方言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方面的作用。与上述第二点的情况相类似,近百年来的汉语方言学几乎完全缩进了纯学术的象牙塔里,很少关心社会大众的应用需求(比如方言字书写、方言文化保护传承等),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未能做出应有的较大的贡献。

附 注

①该刊第1号至48号名为《歌谣》,第49号至1925年停刊时的97号改名为《歌谣周刊》,1936年复刊后又改名为《歌谣》。

参考文献

- 北大研究所国文学门方言调查会 1924a 《北大研究所国文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歌谣》第 47 号。
- 北大研究所国文学门方言调查会 1924b 《方言研究会简章及第二次常会纪事》，《歌谣周刊》第 55 号。
- 北京大学 1918 《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京大学日刊》2 月 1 日。
- 曹志耘 2025 《方言口传文化及其调查整理》，《中国语文》第 3 期。
- 董作宾 1924 《为方言进一解》，《歌谣周刊》第 49 号。
- 黎锦熙 1923 《歌谣调查的根本谈》，《歌谣周年纪念增刊》。
- 李在谦 1922 《格臂草》，《歌谣》第 3 号。
- 廖尚可 2010 《试述五四歌谣运动中的方言调查研究》，《安徽文学（下半月）》第 10 期。
- 林玉堂 1923 《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歌谣周年纪念增刊》。
- 林玉堂 1924 《方言调查会方音字母草案》，《歌谣周刊》第 55 号。
- 林玉堂等 1924 《方言标音实例》，《歌谣周刊》第 55 号。
- 钱玄同 1923 《歌谣音标私议》，《歌谣周年纪念增刊》。
- 容肇祖 1923a 《丫哥哥》，《歌谣》第 38 号。
- 容肇祖 1923b 《征集方言的我见》，《歌谣》第 35 号。
- 沈兼士 1923 《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歌谣周年纪念增刊》。
- 孙本文 1922 《一只橘子抛上天》，《歌谣》第 2 号。
- 王雅观 2022 《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时期歌谣记音方法的探索》，《河池学院学报》第 5 期。
- 魏建功 1923 《搜录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歌谣周年纪念增刊》。
- 赵元任 1930 《广西瑶歌记音》，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周作人 1923 《歌谣与方言调查》，《歌谣》第 31 号。

Ballad Movement and the Inception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ology

WANG Qianqian CAO Zhiyun

Abstract: Ballads and dialects are inherently interrelated, and the study of ballads can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study of dialects. A century ago, the Ballad Movement brought the issue of dialects into the realm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drew widespread attention,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alect Investigation Society, the first academic society for dialec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history.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Dialect Investigation Society engaged in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nature, subjects, and methods of dialec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proposing many groundbreaking theoretical ideas and operational approache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and continue to offer enlightening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in certain aspects to this day.

Key words: Ballad Movement, Chinese dialectology, history of dialectology, Dialect Investigation Society, dialectal alphabet

（王倩倩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610066；曹志耘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王 毅）